

国别史系列



I S R A E L

HISTORY

以色列史

张倩红 著

人民出版社

张倩红 著

# ISRAEL

## 以色列史



责任编辑:杨美艳

封面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色列史/张倩红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国别史系列)

ISBN 978-7-01-006073-6

I. 以… II. 张… III. 以色列-历史 IV. 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4232 号

**以色列史**

YISELIE SHI

张倩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7.25 插页:8

字数:52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6073-6 定价:45.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前 言

当我站立在橄榄山上鸟瞰耶路撒冷全景的时候，当我攀登上马萨达要塞领略海天相接的死海风光的时候，当我静坐在希伯来大学的露天剧场里遥望犹地亚旷野的时候，当我默哀在赫茨尔的墓前由衷地为他献上一束鲜花的时候，我内心的深处都会涌出一股触动、一种幽思、一番感怀。历史学家曾记录过这样一个场面：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曾站在金字塔前深有感触地对将士们说：“5000 年的历史正注视着你们！”两年来，在为这本《以色列史》的撰写而呕心沥血的过程中，拿破仑的话会时不时地在耳边响起，被数千年历史所“注视”的感觉常常会悄然而至，尽管这种感觉反射到自我意识中的是沉重的压力，但理智告诉我：有这种感觉并非坏事，因为追求科学的精神与认真负责的态度往往是与崇高的历史敬畏感相伴而生，后者至少有益于帮助自己克服浮躁、求成的情绪，保持一种相对平和与宁静的心态，这种心静本应该是学人们天经地义的常态，但在当今的中国似乎亦并不尽然。

撰写《以色列史》，首先要面对的是国家起源的时间。在很多犹太人的心目中，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不能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更不能以 1948 年作为开端，现代以色列国家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希伯来王国（公元前 1030 年—公元前 586 年）的延续。当然，这一认识中浓缩了一定的宗教意识与感性色彩。本书把以色列国家的历史追溯到圣经时代，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描述从公元前 2000 年到 19 世纪末犹太人的历史变迁，不仅仅是考虑犹太人的感情，也是为了让中国读者通过对犹太民族的起源、发展与流散的历史回顾，来体味现代以色列国家产生的复杂背景与深刻含义。国家形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文化进程的路径与标志之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从两个方面界定了国家的特征，其一，“它按地区来

划分它的国民”；其二，“公共权力的设立”，并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sup>①</sup> 古代以色列社会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了邦国形态—王国形态—帝国形态的非常典型的国家形态的演变与递进过程，但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就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观念，并确立了完备的君主制度，无疑树立了人类早期国家的典范，为我们研究上古时期的国家形态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公元 135 年，犹太人开始流散于世界，他们虽然忠诚于寄居国，但向往民族国家的情怀与恢复民族宗教、回归祖先故土的渴望始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散居犹太民族记忆与精神世界的主旋律。特别是周而复始的反犹主义，使作为客体民族的犹太人很少能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主流社会，长期遭受的非平等待遇严重摧残了犹太人的思想感情，但也磨炼了他们的坚强意志，更强化了一些人心中故土重返的观念。到 19 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以锐不可当之势在欧洲大陆兴起，从而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与社会基础，1948 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里程碑，也终于圆了一个古老民族长达 1800 年的复国之梦。

马克思曾把犹太民族称作“早熟的民族”，以色列建国之前的犹太历史展现给人们的是一部丰富多彩而又起伏跌宕的画面，它留给世人的启迪与感悟也是多层面的。

第一，犹太人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交往在民族群体与文化传承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交往”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哲学概念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史学家纷纷梳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反复论述的有关“交往”的理论与思想，用以探讨史学研究的新思路。<sup>②</sup> 笔者认为，如果把“交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 卷，第 170—171 页。

<sup>②</sup> 彭树智先生致力于文明交往的思考与研究达 20 余年，其代表作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往论”引入犹太学研究，会对一些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产生新的感觉与领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广泛的历史交往才使犹太人承担起了“中介性客民”的社会角色，才使犹太文化具有边际性的特征，才使犹太民族成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民族群体。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犹太人便自觉不自觉地介入了与迦南人、埃及人、亚述人、腓力斯人、巴比伦人等西亚北非民族的广泛的交往之中，成为与外界接触最频繁的民族之一，从而为本民族的文化率先埋下了“世界性特质”的因子。交往的结果使犹太教从其他地域宗教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当其他民族纷纷衰微之时，小小的希伯来民族却借助于民族之神的力量渐渐勃兴。此后，犹太人作为被征服者又与希腊、罗马文化有了交往。经过长期的接触、融合与扬弃，最终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一起，孕育了基督教文化。历史交往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人类主体之间互相发现、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扬弃、互相融合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保持一种开放性特质，在广泛的交往中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成果的聚合与延续。犹太历史充分证明了历史交往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力。地域性、民族性文化传统如果不能适应交往的扩展趋势，就有可能因自我封闭而失传。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璀璨耀人的古代文明正是因为缺乏正常的历史交往而销声匿迹，美洲的玛雅文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试想，如果犹太人仅仅囿于巴勒斯坦的弹丸之地而不与其他民族交往，那么犹太文化就绝不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特色的影响深远的文化。犹太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不断迁徙，不断流散，表现为空间上的持续位移，在此过程中，广泛地吸收了外部文明的种种特质及要素，丰富了自身的底蕴与内涵，使希伯来文化成为古代中东文明的集大成者。广泛的交往，也促使了民族性格的形成。犹太人的商业特性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其实，这一特征也并非与生俱来，天造地设，而是在历史交往之中逐渐形成的。古希伯来人是作为游牧民族而进入迦南的，正是迦南地区独特的客观环境与社会氛围孕育了他们的从商意识。当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际，迦南文化远远先进于希伯来文化，迦南人频繁的贸

易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尚未定居的希伯来人，他们中有些人逐渐介入了迦南人的贸易活动。此后，随着迦南社会的发展，犹太人的贸易也日益扩大，到所罗门时代，犹太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在分析犹太文化的成因时，绝对不能排除非《圣经》传统的影响。

第二，反对奴役、追求自由的精神风貌是古代犹太人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曾说过：“自由选择的概念是圣经思想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自由选择的概念认为，人们已经学会分辨善与恶，享有自由的个人要为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这样决定一个人在世界上地位的，并不是某条古代的律令，也不是盲目的命运，而是这个人的选择、行动和成败。自由选择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原则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作出自己的决定。”<sup>①</sup>从摩西出埃及到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的历史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主旋律。犹太民族所演绎的“摩西出埃及”的壮丽景观早已被作为人类摆脱奴役、寻求自由的象征而长存于东西方的历史画卷之中；在巴勒斯坦沦于强国统治的非常时期，犹太人为反对罗马帝国的压迫与控制，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抗与斗争，“为了以色列的自由”是支撑他们坚强意志的支柱，“宁可为自由而生，不作奴隶而死”是“马萨达”将士们集体自杀之前留下的最后遗言。历史的脚步虽然悄无声息地尘封了多少往事，但《圣经》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英雄主义不仅留传千古，而且无疑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此后，在国破家亡的历史遭际面前，犹太人又极力保存精神的火种，通过社会精英的努力而传承了民族智慧。大流散时期，对自由意志的追求与向往仍然是犹太传统的核心内容。

第三，追求平等、蔑视权威也是犹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上帝是基于完全平等的观念来塑造人、要求人，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着智能、职位、出身、遗传、财产、品质、贫富等差异，但人在本体上是平等的生灵，任何人不得凌驾于他人之上。犹太人这种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不仅体现于本民族与异族的相互关系上，而且

<sup>①</sup> 西蒙·佩雷斯：《新创世纪》，高秋福、戴惠坤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反映在本民族的内部。在王国时期，有作为的国王常常被作为民族英雄而载入史册，难能可贵的是犹太人却能以一种平常心态去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在充分肯定其作用、歌颂其美德的同时，并不有意掩饰他们的弱点甚至罪过。他们推崇英雄但并不迷信英雄、有意识地美化英雄，这一点在《圣经》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圣经》编纂者对参孙的胆识赞不绝口，但又指出，参孙并未脱俗，且常常违约，有很多远离神道的行为；《圣经》中所描述的扫罗王，统一各部落，制服强敌，并捐躯疆场，洒然而去，表现出一代君王的威力与勇敢，但另一方面，他又妒贤嫉能，狭隘偏执，甚至不惜陷害忠良；《圣经》中的大卫王智能超人，才华横溢，作为国家的真正缔造者而名垂史册，但他又表现出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他曾卑劣地违背自己的诺言，并有过夺人之妻、残害无辜的可耻行为。<sup>①</sup>可见，在《圣经》编纂者的笔下，国王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也有常人的弱点与过错。在古希伯来人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有许许多多揭露王公罪恶的内容，这并不是说古以色列人的王就恶于其他民族的王，只不过是说明古以色列人特别强调国王的过失与“民族之弱点的表现”，并且较多地把这些内容载入了他们的编年史，而这种历史意识正是民族智慧的突出体现。

第四，犹太古代史还展示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相互融合、友好交往的历史画面，从而使我们意识到，不管眼前阿以双方有多少矛盾，但两个民族实现和解的历史基础曾确实存在过，因此我们不应该成为和平怀疑主义者。历史上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种族上是近亲，在地理上是近邻，有着血脉相通的联系。远古时代，他们来往密切，并有着相互联姻的历史记载。第一圣殿被毁以后，流落在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带来了犹太文化的成果，并对伊斯兰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元7世纪之后，随着伊斯兰教对半岛上的反伊斯兰势力采取强硬政策，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并出现了宗教冲突。但当伊斯兰政权稳固之后，双方又出现了和睦相处的局面。特

<sup>①</sup> 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下）》第11章。本书所引《圣经》内容均出自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6年版。



别是阿拔斯王朝时期，许多犹太人取得了很高的政治、军事地位，为王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是在阿拉伯人的宽容与监护下，西班牙等地的犹太社团才发挥了自身的创造力，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在很多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友好交往一直延续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2000年5月纽约大学医学院公布的一项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基因遗传关系。根据对全球29个国家的1371名男子的Y染色体的调查分析显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基因都来自最早生活在中东土地上的共同祖先。该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勒深有感触地说：“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四千多年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中东人的遗传基因。”<sup>①</sup>

## 二

1948年建立的现代以色列国家被称作是“从大屠杀的灰烬中锤炼而出的金凤凰”。建国之初，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地缘政治环境都十分恶劣，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长期敌对更成为阻止其发展的隐患，但是，以色列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实现了政治稳定，创造了经济奇迹，也赢来了文化繁荣，“中东地区的民主孤岛”、“西亚的小龙”成为国际社会对这一弹丸之国的美称。

从政治体制上看，经过激烈的讨论与争议，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以普选制、三权分立、多党并存为特色的政治制度，成为中东地区唯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以色列确立的现代民主制度的思想来源体现了历史传统与外来经验的结合。以色列广泛吸取了西方议会民主制所推崇的权力合法、权力制衡、权力公正等理念，在选举制度、政体结构及其权力运作等方面极力仿效英、美的经验，尤其是被称作“议会之母”的英国的程序与习惯，但又不一味照搬西方的做法，比如，在议会结构的组成上，以色列确立的不是英美的两院制国会，而是典型的一院制议会；在议会选举形式上，尽管许多以色列政治家宣

<sup>①</sup> 转引杨辉：《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2页。

布说：“以色列是西欧议会家庭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与西欧国家大相径庭，以色列并没采取多数选举制原则，而采取了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原则。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广泛吸取犹太民族的历史经验，从“克奈塞特”（希伯来语“大集会”之意）的命名到120个席位的确定，都来源于2500年前的犹太传统。单一比例代表制的作法是1871年以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传统选举方法。此外，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所建立的半自治的议事机构所推行的选举制度以及多党势力的发达都为后来以色列政治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建国58年来，以色列人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摸索新的道路，不断探索更适合本国国情的新模式，政治组合的风风雨雨、议会制改革的反反复复都从侧面反映了以色列人求变革、求完善的政治心态。

在经济领域，以色列人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却紧紧抓住了世界科技革命与西方经济繁荣所提供的种种机遇，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内部条件，探索出一条以科技兴国与出口导向为主战略的经济发展之路，创造出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被联合国认可为“高收入的国家”，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中东的瑞士”、“西亚的日本”、“地中海的香港”等。以色列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奇特性与创新性。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土狭小、沙漠蔓延、资源匮乏、人口有限的国家，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瞩目的现代化成就呢？首先在于以色列政府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的巨大潜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尽力创造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初始条件，既包括自然、地理、人口等客观条件，更包括各类主观条件。因为“现代化运动在本质上既是客观过程，又是主观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客观与主观相互联系、相互反馈、相互修正而又相互统一的过程”。<sup>①</sup>以色列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在重重阻力之下，承担起了国家现代化的倡导者、推动者、设计者及实施者的角色，这是因为刚刚问世的以色列国家不可能像英、美等国那样从社会结构内部产生现代化的动力，犹太社会内部及犹太

<sup>①</sup> 俞新天：《机会与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文化中虽然含有某些现代性的因素，但自身的宗教性特征又使它不可能被原版拷贝过来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单一的精神支柱。因此，现代化的推动力只能来自外部，只能依赖有识之士对现代化策略的选择，依赖国家政权的强制手段来补偿现代化条件的不足。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主观努力往往会造成新的条件，即实现主观愿望向客观现状的转化。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普遍具有后发型及外引型的特点，它是中东国家的有识之士在忧国忧民的意识驱使下，为奋发图强而被迫进行的历史选择，或者说是世界潮流的被动反应，而自身的现代化条件并不成熟或者根本就不具备。这可以说是中东现代化屡屡受挫、且水平有限的根本原因之一。以色列的现代化也是在外力的直接驱动下发生的，但不同的是，建国之后，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拥有了一定的内部条件，并实现了外因与内因的结合，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寻找到了较好的契入点，这样既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又减弱了现代化对整个社会及国民心理所产生的震荡，从而使以色列的现代化与邻近的中东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和谐性特征。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上，以色列表现出明显的超地域性特征。人类历史上的现代化进程按社会形态通常分为三大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和混合类型，所谓混合类型是指“在第三世界崛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兼采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型的不同特色，混合而成，实际上是前两大对立模型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中间发展形式。”<sup>①</sup> 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型，但这一类型中又包括了若干特点互异的发展模式，有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有西亚北非伊斯兰文明区以石油工业为特征的畸形工业化类型，也有拉美地区的“依附性发展”类型。在试图对以色列现代化进行类型分析的思考中，作者发现，以色列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海湾的石油生产国，也不同于中东其他地区的非石油生产国，而是与东亚模式更为相似。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第六章第五节中也指出：“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经验而言，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比较

<sup>①</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成功的国家（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南斯拉夫、以色列等。”也就是说，西亚的以色列和东亚诸国虽然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条件与发展环境，但却选择了共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即通过对外贸易来实现经济增长，来推动工业化进程，来促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成功地完成了经济转型的任务。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以色列是在非和平因素中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且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阿以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因此，在探讨战争这种交往形式与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时，以色列提供给人们又是一个非常规的个案。毫无疑问，战争对国家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对于以色列来说，如果把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力仅作为一种短期的、表层的现象，而从更长远、更深层的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战争与经济发展及整个现代化进程之间有着一种极其微妙的互动关系。<sup>①</sup>

在文化建构方面，以色列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一直是一个焦点与难题，尽管思想家与政治家们一直强调要建立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但一种新文化的建构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实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以色列人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初步形成了“以色列文化”。以色列文化是以犹太文化为主旋律的现代性国民文化。以研究传统犹太人到现代人的转变而见长的卡利汶·戈德沙伊德和艾伦·S. 朱克曼把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人称作“现代犹太人的典范”。在他们看来，以色列的犹太社会与前现代的欧洲犹太社团相比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犹太人所处的政治地位截然不同，由依附性的少数民族变成了唯一犹太国家中的主体民族，具有调整或控制主流社会的能力；第二，以色列犹太社会内部的制度化分离导致了在等级观念及信仰上的差异与冲突，而事实上“内部的分化正是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第三，经济上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机会与挑战远远超过了前现代；第四，宗教热情的降低及宗教体制的分化；第五，同化潮不再成为犹太社团的主要

---

<sup>①</sup> 详见张倩红：《以色列经济振兴之路》，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章。

威胁。<sup>①</sup> 确实，今日以色列虽然存在着种种与现代性相悖的现象，但从主体来看已具备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古老的犹太文明终于回归故土并实现了现代复兴，勤劳而务实的以色列人不仅创造了复兴希伯来语的文化奇迹，而且创造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电影、考古、文博、体育、新闻等文化事业的辉煌与繁荣。5000 年的文化遗产终于在以色列获得了最广泛的发展空间。追寻长达 2000 年的流散梦、回味锡安主义的百年风云、反思反犹太主义所制造的幕幕悲剧、刻画以色列国家的成长历程、描述犹太人的喜怒哀乐等传统主题无疑成为以色列文化的本质特征。同时，以色列文化又是一种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文理性主义精神为主要特色的现代性国民文化。<sup>②</sup> 赫茨尔等人所倡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及政治运动，一直把平等、自由及民主作为自身的社会理想，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及治国方略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

### 三

肯定以色列人的智慧与成就，弘扬以色列历史的独特之处，并不是说以色列就是天堂之地，也无意掩饰以色列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难题。建国 50 多年来，以色列社会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问题，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更使没有回旋之地的以色列国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压力。

第一，安全威胁的长期存在。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奉行“安全第一、和平第二，先有安全，后有和平”的国防观念，但对于国民来说，在享受经济繁荣与福利社会的同时，人们渴望已久的安全需求总是得不到保证，外部安全威胁严重存在，用以军前总参谋长摩西·亚龙的话来说：“在以色列，你分不清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和平；哪里

<sup>①</sup> Calvin Goldscheider, Alan Zucker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ew*, see *The Modern Jewish Experience: A Reader's Guide* (edited by Jack Wertheimer),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1993, Chapter 14.

<sup>②</sup> 详见张倩红：《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 章。

是前线，哪里是家园。”四次中东战争从整体上看以色列是占了上风，但战争对国民心理的巨大创伤并不能轻易弥合，与此同时，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渺茫无期的和平前景，使以色列社会与国民的承受力越来越脆弱，许多人厌倦了这种兵营式的生活，“倒移民现象”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06年7月，当长达6年的巴以流血冲突稍有缓和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再次用火箭弹撕开了以色列人心理上的致命伤口，缺乏安全感的以色列人心理上更显脆弱。

第二，社会整合问题。自建国之日起，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倾向就明显存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复杂矛盾、宗教与世俗的尖锐对抗、西方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的严重隔阂、左派与右派的游离与分歧无不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并威胁着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因此，努力实现社会的整合是以色列历届政府的奋斗目标与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除了东、西犹太人之间与左、右派之间的隔阂有了明显的弥合之外，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以及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趋势。法律在威胁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政权在压力面前常常软弱妥协。再加上民主制度以及多党政治的种种漏洞，使以色列政局总是动荡莫测，甚至风雨飘摇。特别是近10多年以来，巴以冲突的一波三折，中东和平进程的大起大落，更诱发了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社会分裂问题越来越成为以色列人的心头之患。

第三，经济发展的瓶颈。以色列经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如紧张的周边关系破坏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内部资源的奇缺与国内市场的狭小使以色列经济更易于受国际市场上风云变幻的影响，更容易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与威胁，因而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对外援尤其是美援的严重依赖，使以色列常常受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形势的影响；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所建立起来的干预机制曾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在新的条件下却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原则相悖逆；军事工业虽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却造成了庞大的经济负担，并抑制了民用企业的再生产；周期性暴发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与之俱增的通货膨胀

率，严重损害了经济肌体，并破坏了国际投资环境；能源危机尤其是水资源危机日益加剧，更使以色列经济举步维艰。

综上所述，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在朝气与活力之外还积存着种种制约发展与进步的因素，奇迹与辉煌的光环之下依然笼罩着难以排遣的阴影。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似乎不喜欢用“奇异”、“独特”等字眼来描述他们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历史的遭际使他们对“与众不同”之类的叙说总有一种本能的警觉与敏感，他们愿意说犹太民族是平平凡凡的民族，以色列国家是普普通通的国家。然而，不管自我刻画的设计风格如何平常、低调，但以色列人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确实不同寻常。他们总是用“萨卜拉”（Sabra）——沙漠中的仙人掌来描述理想中的国民特征，来比喻以色列国家的人格化个性，因为他们相信，不管环境如何恶劣，无论困难如何巨大，以色列国家都会在沙漠中扎根，在磨砺中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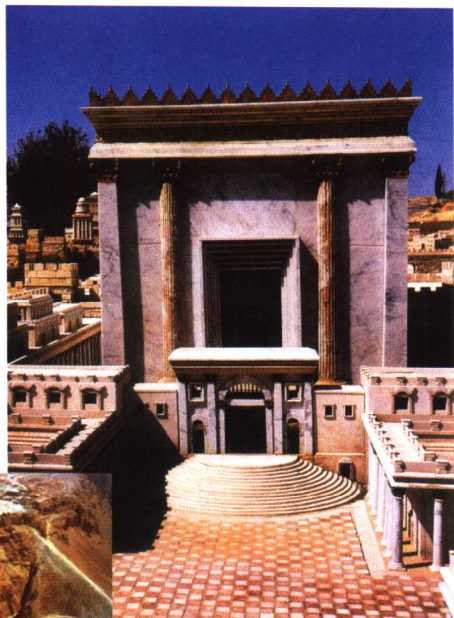


大卫王的加冕礼



所罗门断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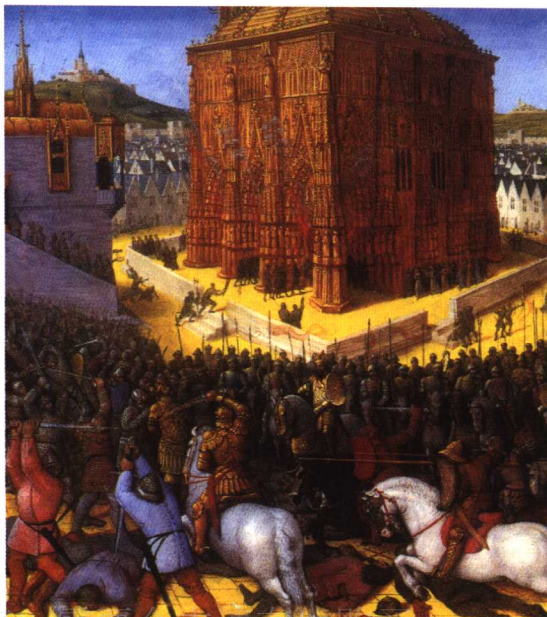




所罗门圣殿  
复原图



马萨达要塞



公元前 586 年  
耶路撒冷陷落